

数据作价出资入股的破局之道（一）：政策与难点解析

（一）一种全新事物的诞生，必然会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一、数据资产作价出资入股：缘起、依据及关联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下称《办法》),其中第六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属等有规定的,股东可以按照规定用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依法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该《办法》将于2025年2月10日起正式施行。

《办法》一经发布,“数据可作为资产进行出资入股”这一规定立即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认为,这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逐步深入探索的必然结果,是标志着数据资源正逐步实现资本化的重要里程碑。然而,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虽然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是数据要素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释放的积极的正向信号,但是在目前的法律框架背景之下,依旧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与挑战,并且在实践当中仍然难以形成具有普适性的操作。

诚然,一种全新事物的诞生,必然会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正如

当年其他传统生产要素的历史变革一样。如 1992 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国家体改委关于印发〈股份制试点企业土地资产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首次从国家层面提出国有企业改制土地作价出资（入股）政策；随后 1998 年，《国有企业改革中划拨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规定》对国家作价出资（入股）政策的内涵进行了明确解释；最后在 1999 年，《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将国有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明确为土地有偿使用方式之一，与租赁政策一样，源于企业改制的作价出资（入股）政策，成为国有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定政策。这一政策的历史变革，意味着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方式迎来了重大革新，从过去相对单一、固化的模式逐步向多元化、市场化的方向转变，为众多改制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拓宽了融资渠道。

同理，如今数据可作为资产进行出资入股这一规定的出现，虽然当下面临诸多挑战，但从长远来看，也有望开启数据资源在经济社会中深度开发与高效运用的新局面，引导各类市场主体重新审视数据的价值，积极探索数据资本化的多元路径，也有望像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一样，逐渐融入到市场经济的核心环节，催生出更多围绕数据资产开展的新型商业模式和合作模式。但这个过程也需要不断地通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配套机制以及积累实践经验等来逐步实现其价值最大化。

“路虽长，行则将至”，在当今的发展态势下，随着各项市场机制的逐步健全完善，“数据资本化”这一理念将不再仅仅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二) 数据作为资产进行作价出资入股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信息资源在时代发展进程中向经济资产转化的必然趋势

2021年施行的《民法典》中提出“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这一表述，虽然未对数据财产的具体保护和利用方式作出明确规定，但从原则上为数据作为一种财产形式受到法律保护提供了依据，承认了数据具有财产属性，为后续将数据纳入作价出资入股的范畴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前提和可能性。

2022年，中央发布“数据二十条”提出建立数据资源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弱化了传统民法体系中的所有权概念，在宏观政策层面初步解决了数据权属不清的问题，为数据资产的确权及后续的资本化利用提供了开创性的制度依据，使数据作价出资入股有了更明确的产权基础。

2023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列举了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股权、债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虽未明确提及数据，但为数据资产作价入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框架和原则。即该法明确了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需具备“可货币估价”和“依法转让”两个关键条件，这为判断数据是否可以作价出资入股提供了重要的衡量标准和思路，为后续数据资产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可作为出资方式奠定了一般性的规则基础，使得数据作价出资入股在公司法律制度层面有了可类比和遵循的依据。

2024年，财政部印发《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了符合准则规定，可确认为相关资产的数据资源，同时规定将数据资源分别纳入无形资产和存货，确定了数据资源在确认、初始计量、后续计量、收入确认等方面的会计处理原则，实现了数据资产入表的里程碑式进展，使得数据资产在财务层面有了明确的处理规范和价值衡量标准，同时也增强了市场对数据资产价值的认可度，为数据资产在交易市场上的定价和作价出资入股的价值评估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数据作价出资入股提供了重要的财务基础和依据。

因此，数据作价出资入股不仅是法律和政策层面对数据价值的高度认可，更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三）特别是国家数据局等部门近期推出的几项政策，有望与《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中关于数据可作为出资入股的规定，在数据要素市场建设的进程中引发一系列积极且有序的连锁效应。

首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六部委于2024年12月印发的《关于促进数据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宏观层面为数据产业勾勒出清晰的发展蓝图，通过优化产业发展结构，引导各类数据资源、技术、服务等相关要素在区域内合理集聚，打造出协同发展的产业链生态。而随着更多数据要素型企业的入局，企业资源互惠需求将急速增加，将可以打破原有资源配置的局限，让数据资源与其他要素更灵活地结合。比如，科技初创企业往往拥有先进的数据处理技术和创新的数据应用模式，但缺乏足够的资金和其他传统资产，通过数据资产入股，

可以吸引资金雄厚但缺乏数据优势的企业进行合作，实现双方资源的互补，进而提高全社会资源的整体配置效率，这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追求资源优化组合的必然结果。

在此基础上，国家数据局近期又出台了《关于促进企业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聚焦于企业层面的数据权益保障与能力提升，健全企业数据权益实现机制，明确了企业数据相关权益的界定与分置运行规则，进一步明确了数据权属模糊这一关键问题，为数据作价出资入股中的“可依法转让”筑牢了产权根基。如此一来，不仅使得数据资产在作价出资入股时具备更高的价值含量与吸引力，也促使数据要素市场中涌现出更多高质量、高价值的数据资产，进一步加速传统产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为产业转型升级持续赋能。

而《可信数据空间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8年）》则着重于构建安全、可信的数据流通环境，通过培育推广不同层次的可信数据空间，涵盖企业、行业、城市乃至跨境等多个维度，为数据的流转与交易保驾护航。在数据作价出资入股的过程中，可信数据空间降低了各方对于数据安全、合规等方面的顾虑，减少了数据交易成本，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协同利用，进一步拓展了数据作价出资入股后的数据整合与利用空间。因为在数据作价出资入股的场景中，合作各方往往对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安全性存在诸多顾虑。毕竟数据资产相较于传统的实物资产更为抽象和复杂，其质量和安全性难以直观判断，而数据空间正好为数据作价出资入股提供了良好、优质的土壤。例如，当企业 A 以数据资产作价入

股企业 B 后，企业 B 可以放心地将这些数据整合进自身的数据体系中，不用担心数据被篡改、泄露或者存在虚假信息等问题，因为可信数据空间提供了可靠的验证和保障机制。这种信任基础的建立，消除了企业在数据整合过程中的后顾之忧，使得数据能够更顺畅地不同主体间流动和整合，从而拓展了数据整合的空间范围，更多企业愿意参与到数据作价出资入股以及后续的数据融合利用活动中来。

因此，“数据作价出资入股”是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以及企业发展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产物。

（四）探索数据作价出资入股与数据资产证券化的关联及路径架构

数据作价出资入股是企业将自身拥有的数据资产作价后投入到其他企业，成为被投资企业的资产组成部分，实现数据资产在企业间的流动与价值整合。而数据资产证券化则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数据资产的流动性与可交易性，将数据资产或其未来收益转化为证券形式在资本市场流通。数据作价出资入股过程中涵盖了数据资产的梳理、确权、价值评估等工作（详细过程将在本系列文章的第二篇详细介绍），为数据资产证券化奠定了资产识别与价值衡量的基础。并且成功的数据作价出资入股实践积累的经验与市场认可度，有助于企业在后续探索数据资产证券化时增强市场信心，降低融资成本。

选取已经完成多次数据作价出资入股交易后的数据资产，通过股权合作的

方式融合具有互补性的不同行业或类型的数据，形成具规模效应和价值深度的数据资产组合构成数据资产池。并对资产池中的数据资产进行标准化处理，包括统一数据格式、规范数据质量标准等，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为后续证券化操作提供便利。同时，依据数据资产的类型、行业应用、收益风险特征等进行分类分级，便于评估资产池的整体风险与收益结构，为证券化产品设计提供基础框架。

再通过设立独立的特殊目的机构（SPV），其主要职责是从数据资产原始权益人（即参与数据作价出资入股的企业）处购买数据资产池中的资产，并以此为基础发行证券，并根据数据资产池的风险收益特征和市场需求，设计多样化的证券化产品。

当然，现阶段政策下，通过数据作价出资入股实现数据资产证券化虽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两者在本质上都是将数据转化为可流通、可交易的资本形态，同为“数据资本化”路径下的各类实践方式，因此主动发现其内在的关联性，并积极探索这些内在关联的有效衔接，才能不断创新新的资源配置路径，毕竟有想象才有空间，有探索才有未来。

二、关于对《办法》第六条“若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属等有规定，股东可按规定用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作价出资”的理解

笔者注意到，在《办法》第六条后半段呈现出这样的表述：“法律对数据、

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属等有规定的，股东可以按照规定用数据、网络虚拟财产作价出资”。从法律解释的分类角度出发，若依据文义解释来剖析此处所提及的“法律”概念，从狭义层面上看，它特指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也就是那些后缀名为“xx 法”的文件。按照狭义理解，只有当这些特定的法律文件中对数据权属作出明确规定时，股东才能够依据相应规定，运用数据进行作价出资。

然而，审视当下我国在数据权属方面的立法现状，不难发现，现阶段我国尚未出台专门针对数据权属的、具有明确条文规定的法律。如此一来，倘若严格遵循上述狭义的“法律”定义去解读《办法》第六条中的这一规定，无疑会在实践中引发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即数据作价出资入股将会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但我们应当认识到，《公司登记管理实施办法》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等法律、行政法规制定的。它在公司法的框架下，对公司登记管理的具体操作流程和要求进行了细化和明确，本次在《办法》中既然提出了数据可以作价出资入股的说法，本意上就是为了在实践中为公司登记机关和申请人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引，否则其完全可以等我国出台专门规定数据权属的法律后，再增加该条款。所以笔者认为，本处视角应是“广义的法律”。广义的“法律”涵盖了诸多不同层级和类型的规范性文件，包含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

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在狭义的法律层面尚未对数据权属有针

对性的规定，但国家已经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数据二十条”）等，这些政策虽不属于狭义的法律范畴，却为数据权属的确认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宏观导向与指引。同时，在实践层面，各地积极探索的数据登记制度也在不断推进，都是围绕着“数据二十条”中三权分置产权制度作为数据权属的判断依据。

因此，在实践中，各地登记机构只有充分理解我国数据产权基础制度的内涵及背景，才可能在实际操作中灵活应对数据作价出资入股的复杂情况（依上文分析，各地关于数据方面的立法文件中，均会贯彻“数据二十条”的精神，因此在实践中，登记机构审查数据权属时，可以参考当地数据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对数据权属进行判断）。此外，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出台更为具体的操作细则或指导意见，明确数据作价出资的具体流程和标准，填补现有法律框架下的空白，也更能顺应我国在数据要素领域不断发展的实践需求，有助于推动数据作价出资等相关实践活动的有序开展。

三、实践中数据作价出资入股面临的挑战与难点

（一）数据权属不明，易引发股权纠纷

相较于传统的企业内部各子公司间数据流通和外部数据交易，数据作为股权出资时，其权属的界定和确认过程更为复杂且要求精确。与前两者相比，数据

作价出资入股所引发的权属不明确导致的法律风险通常更高。换言之，除非是大型数据要素型企业需要进行数据一体化运营管理，否则一般情况下，企业内部数据共享流通一般并不需要对数据权属进行明确界定。即便偶尔出现内部部门、机构或子公司之间对数据权属或分配的争议，通常通过内部协调即可解决。至于数据交易流通中权属不明确的情况，鉴于数据的可复制性、非独占性等特征，除非是极为稀缺的数据资源，否则在发生权属争议时，双方往往也可以通过协商来解决。即便争议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通常也会根据主张数据权益一方的实际损失或对方的获利金额进行补偿，风险尚在可控范围内。当然，数据资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以及这是否会导致受让方主张赔偿，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本文不予以详细探讨。

然而，数据作价出资入股所引发的数据权属争议及其法律风险，其风险程度相对来说就要高得多，主要由于数据作价出资入股必须依法进行转让。如若因数据权属发生争议，数据权益方的主张在法律裁决中获胜，除了需向该权益方支付赔偿外，在未考虑善意取得制度的情况下，股权转让行为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被撤销，这可能导致出资不实的法律责任。与传统资产出资不足的情况不同，传统的资产出资不足可以通过补充出资来解决，而数据作为出资时因为已经转让且可能已经与受让企业的数据融合应用了，若涉及返还问题，将极为复杂，甚至可能直接影响股权受让企业的整体业务。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不仅限于补充出资的问题，还可能面临向股权受让企业承担高额的赔偿责任。

(二) 数据资产价值评估尚处于探索阶段

《办法》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对作为出资的非货币财产应当依法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数据无疑是属于非货币财产，在作为股权出资前需要对其进行价值评估是必要程序。另一方面，准确评估数据资产价值有助于公司了解自身所掌握的数据资产在整个资源体系中的价值地位，进而可以依据评估结果，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将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与数据资产进行有效的整合配置。比如，如果评估出某类数据资产具有较高价值，公司可以加大对该数据相关业务的投入，或者围绕其开拓新的市场和商业模式，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提升公司运营效率和经济效益。

但目前数据资产估值多依赖专业模型，而模型本身可能存在固有缺陷。一方面，估值模型基于诸多假设构建，如市场环境稳定、数据交易流通风险、数据收益增长线性等，现实中复杂多变的市场动态、技术革新冲击极易打破这些假设，导致估值偏离真实价值；另一方面，模型参数选取受限于数据可得性与准确性，若基础数据有误、样本偏差，输入“错误”参数必然产出“错误”估值结果，误导入股决策，为企业后续运营埋下隐患同时也还可能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导致被认定出资不实责任。

(三) 数据合规与安全的要求，成为了数据能够作价出资入股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纵观我国目前发布的各项政策和文件，虽然大力鼓励和支持数据要

素市场的发展，但这些政策文件均一致强调数据只有在合法合规且安全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其价值的有效释放与流转。比如财政部发布的《企业数据资源会计处理暂行规定》明确指出，数据要成为企业资产，必须是合法且权属明确的。

而在数据作价出资入股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数据的转移、共享等环节不仅要严格遵循合规要求，数据安全方面同样面临诸多难点与挑战。一方面，合规层面，我国数据合规要求广泛分布于众多法律文件中，除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重要专门法律外，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以及各类行业规范性文件也都有所涉及。这些文件中的条款繁杂且可能存在相互冲突的情况，企业在实际执行时需依据效力位阶仔细甄别适用，这无疑增加了合规的难度。例如，不同地区对于某些数据的使用范围和条件规定可能存在差异，企业在跨地区进行数据作价出资入股时就容易陷入合规困境。

另一方面，在多源数据融合用于出资入股时，需要整合不同格式、不同存储架构的数据，确保这些数据在传输和存储过程中的安全，技术人员不仅要精通传统的加密、访问控制等技术，还需应对新的数据处理架构和技术带来的安全隐患，如在云计算环境下的数据安全防护，涉及到云服务提供商和企业自身的多层面安全协作，这增加了技术实现的难度。

因此，企业在应对数据合规问题时，务必寻求专业法律机构或资深合规人士的专业指导。必要时，可针对拟作价出资的数据标的开展全面的尽职调查，确保数据具备完善的安全措施与合规性保障，确保数据作价出资入股的顺利推进与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048030024105007045>